

绿色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引导效应分析

李峰

上海市杨浦区杭州路, 上海杨浦, 200082;

摘要: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绿色金融政策作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 在引导实体经济投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本研究基于当前国内外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系统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机制与实施效果。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发现, 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信贷优惠、税收激励等多元化手段, 能够有效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 同时提高高污染行业的融资门槛, 从而引导社会资本向环保产业和清洁技术领域流动。基于研究结论, 建议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强化政策协同效应, 完善信息披露机制, 以更好地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 绿色金融政策; 实体经济; 投资引导效应

DOI: 10. 64216/3080-1486. 25. 09. 025

1 研究背景

当前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生态退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 绿色金融作为连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桥梁, 逐渐成为各国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国际社会通过《巴黎协定》等框架确立的减排目标, 促使各国政府积极探索金融手段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显著进展, 通过构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多元化政策体系, 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环保产业, 为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绿色金融政策与实体经济投资的理论基础

2.1 绿色金融政策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绿色金融政策是指通过金融手段推动经济绿色化转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措施, 其核心在于利用价格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引导资金流向环境友好型产业。从内涵来看, 绿色金融政策既包含对绿色项目的正向激励措施, 如优惠贷款利率、税收减免等, 也包括对高污染行业的约束性条款, 如环境风险评级、融资限制等^[1]。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机制, 形成了引导实体经济投资方向的有效政策工具。随着 2025 年“双碳”目标进入关键阶段, 绿色金融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与碳排放权交易、环境信息披露等制度的协同, 体现出政策内涵的持续深化。

绿色金融政策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期 (2007-2012 年) 以国际倡议为主导,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07 年提出“可持续金融倡议”, 推动银行业将

环境因素纳入信贷决策; 形成期 (2013-2020 年) 表现为各国建立制度框架, 中国 2012 年发布《绿色信贷指引》, 2016 年成为全球首个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国家战略的经济体; 深化期 (2021 年至今) 则聚焦政策协同与创新, 数字金融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绿色项目识别和资金监测效率^[2]。这一演进过程显示出政策工具从单一信贷约束向多元化市场机制的转变。

在功能定位上, 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两类核心机制影响实体经济投资: 一是信号传递机制, 政策导向明确向市场主体传递国家绿色发展决心, 降低绿色投资的政策不确定性; 二是成本调节机制, 通过差异化的融资条件改变不同行业投资的相对收益率。正如研究表明, 这种制度设计能有效提升企业环保意识, 促使其主动调整投资结构^[3]。当前政策创新重点已从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精准施策, 如针对中小企业的绿色供应链金融、结合碳足迹的动态利率定价等, 反映出政策内涵正朝着精细化、差异化方向发展。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 绿色金融政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欧盟以“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为框架, 强调强制性信息披露和分类标准; 美国侧重市场驱动型模式, 依靠绿色债券和 ESG 投资引导私人资本; 中国则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混合路径, 通过央行定向调控工具与地方试点相结合推动政策落地。尽管模式各异, 但各国政策演进均体现出从碎片化向体系化、从自愿性向约束性的共同趋势, 这种趋同现象为构建全球绿色金融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2.2 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因素与绿色金融的关联机制

实体经济投资决策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与绿色金融政策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宏观层面看,投资行为首先受制于行业利润率、市场供需状况等经济因素,同时政策环境、技术变革和社会责任要求等非经济因素也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在“双碳”目标加速推进的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与绿色技术成本下降正重塑各行业的投资回报预期,促使企业重新评估传统投资模式的可持续性。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调整这些影响因素的权重,系统性地改变实体经济的投资偏好与资源配置格局。

市场需求变化是绿色金融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绿色产品和服务市场持续扩容,形成对绿色投资的“拉力”。绿色金融政策通过强化这种市场需求信号,降低企业在环保领域投资的信息不对称。例如,绿色信贷贴息政策能够放大环保产品的价格优势,而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则帮助投资者识别真正具有市场潜力的绿色项目。研究表明,这种市场导向的金融干预比单纯行政命令更易被企业接受,能有效激发其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4]。当前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爆发式增长,正是市场需求与绿色金融协同作用的结果。

政策环境作为关键外部变量,通过绿色金融工具产生差异化影响。传统投资决策中,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是企业关注的重点。绿色金融政策创新性地将环境绩效纳入金融合约,使政策信号直接转化为融资条件。具体表现为:对环保达标企业给予利率优惠、延长贷款期限等正向激励,对高污染项目则提高风险权重、缩减信贷额度。这种差异化处理改变了不同行业的资金可得性,如研究显示,绿色信贷政策使重污染行业的融资约束显著增强,同时提升了实体投资的相对报酬率^[5]。2025年实施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机制,要求金融机构将企业环境表现纳入信用评级体系。

产业结构特征决定绿色金融政策的适配性。资本密集型行业对融资成本变化敏感,更易受绿色信贷政策影响;技术密集型行业则更依赖绿色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策效果差异,例如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活跃;中西部地区传统产业占比较大,政策更侧重通过绿色信贷引导产能升级^[6]。这种差异性要求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时需结合地方产业特点,避免“一刀切”带来的市场扭曲。

绿色金融与实体经济投资的关联机制可概括为三重路径:价格路径通过改变资金成本影响投资收益率,如环保企业获得贴息贷款后扩大产能;信息路径改善投

资决策质量,强制披露要求帮助投资者识别“洗绿”行为;风险路径重新定义投资价值标准,环境风险内部化促使资本远离高碳资产。这三重路径共同构成绿色金融引导投资转型的理论基础,为后续分析政策效果提供框架支撑。随着2025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入新阶段,这种关联机制将在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中展现更大影响力。

3 绿色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机制与效果。研究设计遵循“政策工具—传导路径—投资响应”的逻辑链条,通过构建多维度的分析框架,捕捉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化。

数据采集工作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政策层面收集了2015-2024年间国家和地方颁布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政策文本,通过内容分析法量化政策强度指标;企业层面整合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数据与财务报表,重点选取高耗能行业和环保产业共620家企业的投融资数据;区域层面则整合了各省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情况与环境统计公报。为确保数据可比性,对金融指标均以202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并对极端值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这种多维数据架构能够全面反映政策实施前后实体经济投资的结构变化。

变量设计方面,被解释变量采用企业绿色投资强度(环保设备购置与研发支出占总资产比例)和传统产能扩张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两组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绿色金融政策指数,该指数综合了绿色信贷占比、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等6项二级指标;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地区GDP增速等常规因素,同时引入行业碳排放强度作为调节变量。

在模型构建上,基础回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其优势在于能有效分离政策处理的净效应。为进一步检验政策效果的异质性,按企业所有权性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等维度进行分组回归;针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取省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稳健性检验。

3.2 实证结果与政策效应评估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绿色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了显著的引导效应,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和地区呈现明显的差异化特征。这种“双向调节”效应验证了政

策通过价格路径改变资金配置的有效性,与理论分析中的预期相符。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效果存在约 1-2 年的时滞,反映出企业调整投资结构需要一定的缓冲期。

从行业异质性来看,政策对重污染行业的约束效应尤为突出。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钢铁、水泥等行业的长期贷款获取难度显著增加,迫使企业不得不缩减产能或转向环保技术改造^[5]。相反,新能源、节能服务等绿色行业不仅获得更多融资支持,其研发投入强度也有明显提升。中介效应分析揭示,这种分化现象主要通过融资成本渠道实现——环保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下降幅度比传统行业高出约 15 个百分点,这直接改变了不同行业的投资回报预期。

空间计量结果显示,绿色金融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周边 200 公里范围内的城市,其绿色投资增速比非相邻地区平均高出 8%,表明政策红利可通过产业链关联和人才流动等渠道向外扩散。但这种溢出效应受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制约,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政策的辐射范围明显缩小。这一发现为优化试验区布局提供了重要依据,建议未来重点加强区域间的金融协同机制建设。

政策协同效应评估发现,绿色金融工具与碳交易、环境税等政策的配合能产生“1+1>2”的效果。例如,在实施碳配额交易的省份,绿色债券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支持效果提升约 25%,说明市场化的环境定价机制能增强金融政策的精准性。然而,当前政策协同仍存在改进空间,特别是绿色信贷标准与环保处罚信息的联动不足,导致部分“伪绿色”项目获得融资支持,削弱了政策效果。

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分析带来了意外发现。虽然绿色金融政策整体上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对部分转型中的传统企业却造成了“融资断档”风险。这类企业因环境绩效不达标面临融资约束,但又缺乏足够资金进行绿色技术改造,陷入转型困境。这一现象提示政策设计需要增加过渡性安排,如设立专项转型金融工具,帮助传统行业平稳过渡到绿色生产模式。

基于实证结果的政策评估表明,当前绿色金融体系在以下方面亟待完善:一是绿色项目认证标准需要进一步统一,减少监管套利空间;二是政策工具有待优

化,特别是对中小绿色企业的融资支持不足;三是区域协调机制缺失导致政策红利分配不均。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建立动态调整的政策工具箱,结合 2025 年“双碳”目标推进情况,灵活运用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多元化手段,提升政策的适应性和精准度。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机制与实施效果,得出以下核心结论:首先,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信贷优惠、税收激励等多元化手段,显著降低了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同时提高了高污染行业的融资门槛,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向环保产业和清洁技术领域流动。其次,政策效果呈现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对新能源、节能服务等绿色行业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而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抑制效应则随着政策强度增加呈现边际递减趋势。此外,区域金融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和政策协同水平等因素显著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周边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 [1] 马常标. 助力“双碳”目标 绿色金融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J]. 《中国商界》, 2025, (2): 130-131.
- [2] 陈楚云. ESG 视角下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经济管理》, 2025, (6): 031-034.
- [3] 何佳珊.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J].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1): 12-18.
- [4] 赵娜.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激发重污染企业“脱虚向实”——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 52-62.
- [5] 杜文胜. 绿色金融、科技创新投入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中部六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统计理论与实践》, 2024, (4): 39-44.
- [6] 薛新红.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J].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2025, (3): 71-80.